



周颂伦 孙志鹏 编著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战后日本转型真相

对 36 个问题的思考



新华出版社

014039442

周颂伦 孙志鹏 著
54

D731.3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战后日本转型真相

对 36 个问题的思考



D731.3
54

新华出版社

544830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日本转型真相：对 36 个问题的思考/周颂伦、孙志鹏编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66-0960-6

I. ①战… II. ①周…②孙…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日本 IV. ①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498 号

战后日本转型真相：对 36 个问题的思考

作 者：周颂伦 孙志鹏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王金英 刘 飞

封面设计：图鸦文化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7

字 数：45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960-6

定 价：4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言：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总特征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结束战争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70年。在这近70年里，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不同层面的不同变化聚集在一起就使得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两次转型：其一是从战时统制社会向产业社会的转型，其二是从产业社会向福利社会的转型。无论是产业社会还是福利社会，其本质都是大众社会，可以说，福利社会是在产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成熟的大众社会。因此，本书正是通过对战后日本社会各个阶段、各个层面的分析，考察战后日本产业社会的形成以及产业社会是如何向福利社会转型的总过程。

第一次转型是从日本战败和美国对日占领开始的，从时间上讲是从1945年到1973年这28年左右的时间，统制型社会完成了向产业型社会的转型，其中又以1955年为转折点，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55年。这一阶段的日本社会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对由战时统制社会所产生的战争遗留问题进行处理，主要是进行非军事化、东京审判、处理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解散财阀；二是对政治、经济、教育等体系进行改革，主要是制定新宪法、进行农地改革、重组财阀，以及尽快恢复日本经济的各项措施。

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之后，首先日本被实施非军事化政策，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第一号指令，解散了日本的陆海军，停止了军工生产，摧毁了日本的战争力量，为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军事基础。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实施，核心是和平民主、主权在民、尊重人权，奠定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政治理念。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前后历时两年半，东京审判的意义在于它让战争的发动者与实施者承担自己的罪

行，昭示了正义、和平与民主的力量。

战后赔偿是对日本在战争期间对所侵略国家与人民的一种经济补偿，只是由于各国间利益的不协调以及美国的态度逐渐软化，对日赔偿要求的金额逐渐下降，虽然赔偿问题最后在《旧金山和约》中有所规定，但是惩罚力度明显减弱。

从1945年11月到1948年初进行了财阀的解散工作。虽然解散了旧式财阀的资本系统，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并不十分严格，为随后财阀的重组留下了余地。

从1945年10月到1950年7月，日本先后进行了两次农地改革，其宗旨是打破农村的寄生地主制，建立以自耕农为基础的稳定农村社会，为战后日本农村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个战争遗留问题就是对日和约的签订。1951年9月，美国完成了由其单方面组织的对日媾和计划，有48个国家在9月8日与日本签订《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结束对日占领，承认日本主权。当天，日本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这两个条约再加上1952年2月28日签订的《日美行政协定》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旧金山体制”。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正式始于1948年10月的NSC—13/2号文件（文件标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之报告》）。这份文件的出台表示美国对日媾和方针的确定，同时开始了复兴日本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日本经济的恢复工作从战败之后就开始被考虑了，只是没有从政策上加以确定。1946年8月12日，日本政府正式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有计划地开始了经济恢复工作。同年底，吉田茂内阁确定了以煤炭、钢铁为中心的倾斜生产方式，从工业生产领域开始了日本的经济复兴计划。到1948年底，日本经济在倾斜生产方式的作用之下，工业生产指数已由战败初年的30%左右上升到60%以上，战后经济破败的景象已经改变，供给紧张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国民的粮食也基本得到保障，解决通货膨胀的时机渐趋成熟。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为了稳定经济和收缩通货膨胀，日本实施了以超平衡财政为中心的“道奇计划”，解决了战后长期困扰日本的通货膨胀问题，使日本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加强了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此期间，日本进行了夏普税制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制度，确保了国家税收的稳定。由于道

奇计划严格限制通货膨胀，使日本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最大发挥，甚至产生了“稳定恐慌”。但是这一恐慌很快就被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引发的“特需景气”所消弭，“稳定恐慌”期间积压下来的约1000亿—1500亿日元的滞销商品被迅速订购，仅1950年7月份的出口额就有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了18%。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日本的“特需”收入达到12.8亿—23.8亿美元，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速度。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从1953年10月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年的全面整顿。因为提前预料和调整及时，加上“特需”期间的积累，日本经济最终安全度过了“停战不景气”时期。1954年11月，日本经济触底反弹，转入了被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第二阶段：1956—1973年。这一阶段的日本主要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战后日本的产业社会正是在这一阶段初步完成的。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形成“五五年体制”，经济上以年均增长率9.3%的高速度增长，外交上实现了日苏复交、新日美关系定位、日中邦交正常化，社会总体层面上国民参与政治的普遍热情、教育的高学历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能力的上涨、新中间阶层的兴起、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健全、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等。

从东久迩内阁（1945.8.17—1945.10.5）到第二次鸠山一郎内阁（1955.3.19—1955.11.22），日本政党经过多次分化组合，社会党最终于1955年10月13日宣告统一，自由党和民主党也于同年11月15日正式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从1955年自民党成立到1993年自民党大选失败，自民党长期占据执政党地位达38年之久，与此相对社会党长期处于在野党地位，这种体制被称为“五五年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目标基本稳定，是推动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有力保障。1956年时，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在经济层面已经走出了“战后”的阴影，于是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结尾写道：“已经不是战后的。”1956—1973年间，日本的出口比重在下降，经济增长的方式开始向以民间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变，尤其是对重化学工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尤为明显，并且形成了以投资带动投资的热潮。此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以技术革新为主的设备投资逐渐增多，再加上引入了海外的管理方法，日本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1954.11—1957.6）、岩户景气（1958.6—1961.12）、奥林匹克景气（1962.10—1964.10）和伊奘诺景气（1965.10—1970.7）四次景气上升高峰。在这一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日本在外交

上也取得重大成果，即日苏复交、新日美关系和日中邦交正常化。1956年10月19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共同宣言》，打开了日苏外交的僵局，为日本加入联合国和重返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新的安保条约增加了日本的独立性，提升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日本在经历了“越顶外交”（1972年，尼克松访华没有事先知会日本，被日本称为“越顶外交”）冲击后，开始考虑恢复日中关系。1972年9月29日，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逐步推进了日中之间的经济、外交联系。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外交正常化只是战后日本发展的一种外在指标，以此作为衡量日本社会转型与内在发展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日本是否最终形成产业社会还需要通过产业构成和国民生活的实际变化情况进行说明。

《日本国宪法》恢复了日本人民的“国民”身份，赋予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1956年，日本拥有政治权利的人数有501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6.06%，比1946年增长了7.41个百分点。1956—1973年间，日本拥有政治权利者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投票比率维持在70%—80%之间，而且以1968年为界，女性投票率开始超过男性，说明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开始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向。参与投票人数的增长，一方面是新宪法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战后日本高学历教育体制的成果之一，培养了国民的民主政治意识。1954年，日本的高中入学率为50.9%，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入学率为10.1%；1974年时，两者分别上升至90.8%和34.7%。教育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从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上来讲，1955年时，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实际构成比分别为21.4%、29.6%、49.0%，而到1973年时，分别为5.2%、45.0%、49.8%。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基本不变。衡量产业社会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以及从事不同产业人口的构成比例，显然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日本已经转变成为产业社会了。伴随产业社会的形成，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1955年，三大都市圈人口合计332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9%，1970年时，分别上升到4826.9万人和46.1%。从日本总体的城市化水

平来看,1955年时日本的城市化率为56.1%,1970年时为72.1%,1975年时为75.9%。农村人口向以东京圈、关西圈、名古屋圈这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迅速流动,在1961—1962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也就是说,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初已经实现了城市化的日本在进一步地向高度城市化的水平发展。

战后由于非农性产业部门的发展,大量的青年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既缓解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单身家庭和核心家庭数量的增加,又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进而再次刺激工业生产的增长。由于技术革新和价格竞争,导致新产品的迅速普及和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下降,日本开始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地出现大众性的消费热潮。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三大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为主的家庭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到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水平,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迅速上升。以黑白电视机为例,1960年时,在公务员、职员、工人、农民阶层的普及率分别为82.7%、51.9%、25.4%、11.4%,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基本达到100%,而且彩色电视机也开始被大量生产和消费。在产业社会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战后日本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中间阶层的整体壮大,日本国民中间逐渐产生了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流意识”,对当下生活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人数持续上升。根据不同的调查数据,在这一阶段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等水平”的人占总人口的80%—90%,形成了一种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

在社会保障和环境对策方面,日本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1951年,日本制定了《社会福利事业法》,主要包括生活保障事业、儿童福利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三项内容。到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全面确立,这一成就的标志是1961年“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实现。随后,在1962年和1964年分别制定了《老人福利法》和《母子福利法》,老人福利事业、母子福利事业相继成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而且,日本自197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71—1972年建立了普遍儿童津贴制度和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1973年时又把老龄福利年金从月金额2000日元提高到5000日元(1979年又提高到2万日元)。同年还制定了年金额随消费物价指数自动调整的办法,即如果物价波动超过5%,则年金额自动调整。医疗保险制度也补充

了新的内容，引入了高额疗养费制度。1973年由于实施了这一系列新的福利措施，而被称作“福利元年”。另一方面，在产业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附带产生了环境破坏、公害问题、城市人口过密化等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和生活质量。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随后的两年在日本出现了四大公害诉讼事件（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它们是日本在高速经济发展期，由产业活动所排出的有害物质而引起的疾病。在1970年一次性通过了与公害防治有关的14条法案，因此这一届国会被称为“公害国会”，翌年，日本正式设立环境厅，开始致力于环境对策。

第二次转型是从“福利元年”和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的，从时间上讲是从1973年直到现在约40年左右的时间，产业型社会完成了向福利型社会的转型，其中又以1985年和1991年为转折点，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3—1985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产业社会完成转型和向福利国家进行转变的过渡。1973年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年份：其一是实施了年金的物价浮动制和老年人医疗费用免费化，被称为“福利元年”；其二是以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标志，日本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时代，1973—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6%。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兑换，并且开始征收进口税，被称为“美元冲击”。受此影响，1971年12月日元由原来的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升值为1美元=308日元，再到1973年2月变为浮动汇率制。为了应对日元升值，日本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也随之出台，试图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和拓展产业圈的地域范围来解决日元升值和经济增长这一矛盾。但是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继而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2%）。此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高增长率的停滞只是一个外在的信号，最主要的变化是产业增长的模式。从1974年开始，由于能源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双重压力，以往以钢铁、造船、重化学工业为基础的产业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以电子机械、汽车制造等加工组装型产业的发达，日本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设备投资主导型向出口主导

型转变。日本的汽车生产辆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开始稳定、持续地增长，70 年代末期已经达到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地步。而且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开始研究节能技术，调整雇佣以及劳资关系，日本的生产率开始上升，顺利渡过了 1979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但同时由于日本出口额的迅速增加，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开始增多。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日本的产业社会已经接近成熟。从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上来讲，1973 年时，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实际构成比分别为 5.2%、45.0%、49.8%，而到 1985 年时，分别为 3.3%、42.6%、54.1%。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第三产业取得主导地位，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已经凸显。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数比例来看，1970 年、1975 年和 1980 年分别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46.6%、50.1% 和 55.5%。在城市化进程方面，由于之前的城市化基础牢固，1985 年与 1970 年相比，三大都市圈总人口只增加了 2.5%。从日本总体的城市化水平来看，1975 年时日本的城市化率为 75.9%，1985 年时为 76.7%，仅增长了 0.8%。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在石油危机爆发前就已经急剧减少了，农村人口向三大都市圈的大规模流动基本停止，城市化处于平稳的巩固时期。

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持续稳定，城市的家庭数量没有出现明显增加，再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家电市场的饱和，以家庭数量为支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内需增长机制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消费中的服务性支出开始增加。70 年代，住房、家电、医疗保险、衣饰的支出开始下降，而教育、文化娱乐、交通信息等服务性支出开始上升。这都说明，高度成熟的产业社会中，满足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已经不是问题了，人们所追求的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1973 年，日本政府通过年金的物价浮动制和老年人医疗费用免费化，开始扩大养老金的支出，社会保障的费用在一般年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由 1970 年的 19.0% 迅速增加到 1980 年的 26.7%。因此，1975 年日本开始发行赤字国债，1979 年的国债依存度已经增加到 34.7%，随后便开始了以摆脱赤字财政为中心的行政与财政改革，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平衡财政、削减医疗费用、国营企业的民营化。

第二阶段：1985—1991 年。虽然这一阶段只有短短的 6 年时间，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阶段，日本的产业社会已经高度成熟，福利模式开始由福利

国家向福利社会进行转变。从1985年为了解决国家贸易摩擦的“广场协议”开始，日本结束了稳定增长时代，开始进入泡沫经济的发展时期，日本在1985—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2%。

1985年进行“广场协议”的主要目标是调整美元比价和消除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状况。1986年初，日元迅速升值。同年，日本开始制定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政策，经济结构开始由出口主导型向国际协调型转变。在扩大内需方面，主要是扩大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通过取消小额储蓄优待税制减少居民储蓄，刺激居民进行消费等。从1986年1月起，官方利率由5%下调至4.5%，一年后又下调至战后最低点2.5%的水平。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日本经济在1986年末跌入谷底后触底反弹，景气开始回升。

1985年时，日本对10亿日元以上的大额定期存款采取了利息自由化政策，大企业开始在海内外通过直接金融进行融资，以股票的方式进行运作，而大量的资金流入市场直接导致了股价的飞涨。1985年的日经指数为12000点左右，到1989年底已经飞升至38915点，创造了史上最高纪录。由于大额资金的筹措有脱离银行的趋势，所以银行开始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流向建筑和房地产业，又导致了地价的飙升。1986—1990年间，商业用地价格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87年的上涨率达到21.9%；住宅用地的价格也在这一期间迅速上涨了。但是好景不长，股价和地价在1991年开始迅速下跌，1992年8月份的日经指数跌破15000点的大关，倒退到80年代中期的水平。诱发这一现象的导火索是日本银行转向金融紧缩政策，另外就是政府对地价上涨的政策抑制。日本银行在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这15个月的时间连续五次上调贴现率，利率从2.5%上升至6.0%。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制定了控制房地产金融总量的政策，缩小了对土地的投资额度。泡沫经济在经过5年的增长后在1991年初迎来了终结时期，此后日本进入了经济低迷的平成萧条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加上雇佣的不稳定，造成了个人消费状况的低迷。在社会保障方面，1985年，日本建立了适用于全体国民的养老金，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养老保险。80年代后半期，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全民福利的道路是否符合日本国情，产生了“日本型社会福利”的构想，对70年代实施的“高福利高负担的福利国家模式”、“优先发展社会保障的方针”、“高度集权的福利行政”的福利模式进行批判。最后占据主流的意见是：日本既不适合高福利高

负担的模式，也不适合低福利低负担的模式，应该走中福利中负担的中间道路。以中间道路为基准的日本型社会福利更强调社会福利的分权，从当时的中央集权型向分权型转换，也就是从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的转变。另外开始重视发挥民间、家庭、社区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对东方家庭养老扶幼的传统美德的发扬等。借助这一思潮，日本政府一改对福利财政温和的面孔，开始紧缩福利财政开支，重新强调优先发展经济的方针，对福利政策进行大幅度修正。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在政治方面，自民党在1993年丧失了持续38年之久的“一党优位”，自民党、社会党和民主党前赴后继，在国会选举中上演争夺战，政治利益开始多元化，不稳定性开始增强。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转入持续低迷的阶段，1990—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5%左右，因此整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2年以后虽然出现了经济持续复苏的迹象，但是又遭遇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大幅度改革，加大了社会的参与力度，日本正在向完善的福利社会缓慢而艰难地前进。

冷战结束后，自民党失去了国际保守阵营的有力支持，致使内阁频繁更迭、议席下降，派系斗争加剧并最终分裂。1992年5月，原为自民党副干事长的细川护熙退出了自民党，同时成立了日本新党；是年底，竹下派因小渊惠三和小泽一郎之间的权力斗争，自民党内部的最大派系分裂成为小渊派和羽田派。这两次分裂直接导致了自民党在1993年的大选中失败，丧失了组阁的权力。自“五五年体制”崩溃以后，无论是“七党一派”的执政同盟，还是后来的多党联合执政，联合政权已经成为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主体政权框架。1996年自民党以联合政权的方式重新执政，实现了“新一党优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在2009年第45届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全部480个议席中的308席，超过控制众议院各种常设委员会的绝对稳定多数269席，取得空前胜利。大政党的解体和小政党的产生，反映的是当前日本社会内部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和无党派立场的中间选民数量的增加，这种现象是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相联系的。

1992—1996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0.6%，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消费税上调的影响，1998—1999年日本经济转入负增长，直到2002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才呈现出持续性复苏的迹象。1997年金融危机后，

日本开始了财政结构改革，包括削减财政支出、上调消费税率、停止所得税和居民税的特别减税政策、增加健康保险的负担等。2001—2006年的小泉内阁进行了以邮政民营化为目标的改革，小泉内阁末期，赤字财政已经有所改善。但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金融海啸，原油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日本经济再次面临重大困难。日本政府在2006—2010年的财政投入高达193.5万亿日元，用于振兴经济，力图稳定民心，增加内需。但是最近几年，在需求紧缩、生产低迷的世界经济趋势下，作为岛国的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恢复经济活力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福利社会的发展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分别制定了《黄金计划》、《天使计划》和《新黄金计划》，旨在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护理水平和新生儿的出生率。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年人口出生数超过200万人，而2007年时减少至107万。最近几年，日本又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国家的行列。自2007年起，日本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到2020年日本7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会占到老年人口比重的一半以上。日本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劳动力严重短缺，而为了支付高额的社会保障资金，政府又不得不增加税收，这些将更多的由有限的劳动力所承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日本在财政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是日本在产业社会已经完成转型、正在向更加完善的福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日本所面临的是高福利的“幸福”难题，而不是产业发展的“生存”难题，这和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不同的。

目 录

序言：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总特征	(1)
-----------------------	-----

第一编 改革与重建

1. 盟军最高司令部在战后日本改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2. 东京审判为何一直存在争议?	(13)
3. 日本的战后赔偿是如何进行的?	(22)
4. 日本国宪法与明治宪法有什么区别?	(31)
5. 战时统制体制是怎样与战后社会相衔接的?	(40)
6. 日本是怎样进行农地改革的?	(51)
7. 财阀的解散与重组是怎样进行的?	(61)

第二编 经济与政治

8. 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形成与特点是什么?	(75)
9. 战后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形成的?	(86)
10. 倾斜生产方式在战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96)
11. 何谓道奇计划与夏普税制改革?	(106)
12. 特需景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	(115)
13. 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24)
14. 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构想是什么?	(139)

- 15. 日本是怎样渡过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 (150)
- 16.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泡沫经济? (160)
- 17. 如何看待近十年来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 (170)
- 18. 日本政要为何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178)

第三编 军事与外交

- 19. 冲绳问题的由来与现状是什么? (193)
- 20. 日美同盟的形成历程与发展走向如何? (205)
- 21.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是怎样演变的? (215)
- 22. 日本对华 ODA 是怎样形成的及执行情况如何? (226)
- 23. 为何会发生北方四岛问题? (236)
- 24. 日本对东南亚、欧盟、拉美和非洲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246)
- 25. 中曾根康弘为何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 (259)

第四编 企业与社会

- 26. “日本式经营”的特点是什么? (273)
- 27. “新中间阶层”与“中流意识”的特点是什么? (283)
- 28.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经验是什么? (292)
- 29. 日本学校教育制度是怎样进行结构改革的? (303)
- 30. 战后的东京大学是如何转型的? (315)
- 31. 日本是怎样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 (327)

第五编 文化与展望

- 32. 怎样通过《文明论概略》、《武士道》和《菊与刀》理解日本文明?
..... (339)
- 33. 宗教信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54)

34. 如何看待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365)
35.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376)
36. 目前日本面对的困难有哪些?	(389)
结语: 战后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经验与启示	(403)
参考资料	(406)

第一编
改革与重建